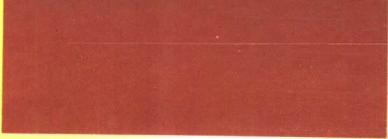


XINWENXUEZUOJIA

WAIGUOWENHUA



新文学作家

XINWENXUEZUOJIAYUWAIGUOWENHUA

与外国文化

顾国柱



XINWENXUEZUOJIA

上海文艺出版社

WAIGUOWENHUA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陈 征

封面设计：王志伟

新文学作家与外国文化

顾国柱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125 插页 2 字数 165,000

1995年6月第1版 199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321-1306-X/I·1018 定价：8.10元

序

贾植芳

1917年发端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以至由此开始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它与传统文学最大的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在当时开放性的文化环境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对待西方从文艺复兴至二十世纪出现的各种外来文化,包括西方现代派哲学和文学思潮与理论,因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面对的西方世界,正是现代主义哲学和文学兴起时期,正如胡适1919年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所归纳的两种趋势:“一是研究问题,所涉及的有(1) 孔教问题;(2) 文学改革问题;(3) 国语统一问题;(4) 女子解放问题;(5) 贞操问题;(6) 礼教问题;(7) 教育改良问题;(8) 婚姻问题;(9) 父子问题;(10) 戏剧改良问题。二是输入学理,被输入的有易卜生思想、马克思主义、杜威学说、以及各种‘现代思潮’如尼采哲学、罗素哲学、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全民政治和新村主义等”。^①胡适这里归纳的两条,从新文学运动的现实表现看来,他所说的那些“研究问

题”的各种内容,正是“五四”初期小说创作的主要题材和主题(所谓“问题小说”);他所说的“输入学理”,就是说,当时接受西方文化是多元化的。这就反映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文化视野的开阔性,他们多元化地接受西方文化,包括现代派哲学和文学思潮,这也就是他们的文化性格的一种特质。所以我说中国新文学运动与传统文学最大的区别是它以开放性文化心态,在继承传统的同时,革新或改造了中国传统文学,是一种新的质的飞跃。而外国文化和文学,在当时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撞击融会中,作为新的文化血液,改革和发展了传统文学,是属于一种新的历史范畴的文学现象。正因为如此,观察和研究中国新文化或文学运动,如果不以外国文化、文学为参照系,就不能真正认识中国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基本品格。正因为如此,在建国前出版的有关中国新文学史论著中,如胡适为《申报》六十周年所撰写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申报馆1923年10月版),1929年及三十年代初出版的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的变迁》、《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36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年》,则是按各种文体分卷,分别由胡适、郑振铎、鲁迅、郑伯奇、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洪深和阿英执笔的《导言》以及蔡元培写的《总序》,都把借鉴和吸取外国文化、文学以改造、革新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历史特征作为立论的依据,以至四十年代出现的阿英的《晚清小说史》,也注意到这种历史的真实。

建国以后,我们按照中国政治历史分期,把1917年至1949年建国前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称为“现代文学”,这之前,即由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7年“五四”以前时期称为“近代文学”,

建国以后即从1949年开始称为“当代文学”。这种历史分期方法，生硬地割裂了文学史本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从而陷进了形与体的矛盾，以现代这一时间概念，代替了新文学这一性质概念，而现代文学这一历史范畴所包容的，除过与旧文学相对立和区别的新文学之外，还有其它的属于旧文学范畴的文学现象，如章回体小说、旧诗词、传统戏曲、曲艺等，而这些传统文学现象，是不属于“新文学”这一历史范畴的存在，而在建国以后出版的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著中，虽然接触的也仅是“五四”新文学史内容，但在论述中国新文学史论著中，基本上把新文学借鉴外国文学改造中国旧文学这一历史特点抹去了，也等于否定了“五四”这一划时代的新文化、文学运动，这也反映了极左思潮对中国新文学建设的一种扭曲变形，或者说一种误解。孔子曰：“必曰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行”。为了纠正这一历史失误，青年一代前几年提出了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看法，并不是事出无因的。

七十年代末以来，比较文学在我国重新崛起，这一新兴学科虽然从“五四”前后，也就是从它在西方诞生不久，即被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引进我国，但从二十年代后期以后，比较文学因为来源于西方，在苏联被宣布为“禁区”，以至作为一种思想冲击波，也影响了比较文学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命运。对我国来说，从七十年代末以后，即我国清除了极左思潮，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以来，它才在我国像烈火中的凤凰似的新生了。这十多年来，我们中国比较文学界，除过注意译介西方这些年来有关这一边沿学科的概念、理论、方法、历史等范畴的论著外，就是在纵向上继续了我国“五四”新文

学传统,把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整体文学的框架来审视和研究,在实践性的比较文学研究中,二十世纪中外文学的影响关系研究,就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界热点论题之一。

又由于多少年来,由于西方“欧洲中心论”这种沙文主义的观念,西方不少学者把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称为是对西方文学的“移植”运动,极大地歪曲了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这样夸大外来因素的影响,势必会淹没民族文化自身内部生长的历史规律,淹没中国现代作家文化、文学思潮的主要来源和独立的学术品格。更何况我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悠久文化、文学积累的民族,正像近代学者辜鸿铭所说:“我们祖宗穿绸着缎的时候,西方民族还生活在原始森林里”一样,这话虽然说的有些国粹派味道,过了头,但它也透出这个历史真实:中国并不是一个文化空白区,需要从海外移入别国文化来填补;外国文学进入中国是进入一个有悠久的民族文化、文学传统的国家,外来文化、文学进入中国后,与本土文化相会时,必然发生激烈撞击,而经过选择、改造和融会的过程,作为一种新的民族文化素质,一种新的文化营养液,进入本民族文化、文学系统,它更新和发展了本民族文化,“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使民族文化和文学始终保持了汹涌澎湃的前进运动的势头。

顾国柱同志这部新著《新文学作家与外国文化》,正是他多年研读心得的一个结集。它选取了十位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专题研究他们个人和外来某种思潮代表人物或文学现象的关系。这十位作家,除诗人艾青和穆旦外,大都是“五四”老一代的作家,又除穆旦是出身于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外语系

外,其他各位都是东西方留学生出身,或到东西方国家生活过的中国新式知识分子;就连穆旦也算上,他们又都是外国文学介绍者和翻译家,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不仅文化视野开放,知识结构也比较完整,而且不仅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而且接触和接受西方文化也是多元化的,而他们接收和吸取外来文化和文学的媒介体,基本不是以中译本为主。所以说,他们可谓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他们的文化性格,从纵向上继承了中国文化、文学传统,横向上接受了西方文化和文学,在他们身上,是中外古今文化交汇融合的一个焦点。他们是有别于中国传统的封建士大夫的新式中国知识分子或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顾国柱同志这本专著,在每个论题上,都是多角度地审视和考察了他们和特定的外国文化、文学现象的关系,即他们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接触或接受它们的,他们是从什么角度,从被接受者那里选择和接受了什么东西,接受影响的性质和程度,以及他们是以何种形式接受的,和它的具体表现形态,即影响表现是什么,等等。因为如前所云,接受的过程,决不是简单的移植运动,而是经过接受者选取、改造、融合的消化过程,其中必然发生变异现象。换句话说,他们接收的已不是原型文本,而是经过改造变形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对原型文本,是一种背叛;而一切又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正如作者在谈到郭沫若与尼采一文中,所引用的郭氏在谈到他译《查拉图斯特如是说》时所说的:“我译尼采,便是我对他的一种解释”,“我是一面镜子,我的译文只是尼采的虚像。”如果我们真有兴趣,不妨将“五四”初期中国知识分子如王国

维、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对尼采接受的侧重点与四十年代出现的战国策派陈铨等人接受尼采的侧重点比较一下，便大有文章可做。

因此，我觉得顾国柱同志这本专著最大的特点是，他不仅以开放性的学术视野，运用一些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新的视角来审视和论证他所感兴趣的一些中外文学人物或思潮之间的影响关系，更可贵的是他对这些历史上的中外文学现象得出了一些有自己独到见解的新阐释、新认识。对我国方兴未艾的二十世纪中外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可说是增添了一些新的历史积累、新的贡献。因此，它是以自己的存在本身，在学苑中取得了它自己的生存权利的。在目前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知识贬值的时代，他能甘于清贫与寂寞，坐这条做学问的冷板凳，这种精神境界，就值得感谢和敬重。也因此，我虽然身在病中，但还是坚持写了这篇称为序的小文，除过发一些卑之无甚高见的议论外，更主要的是，我乐意把顾国柱这位年轻同志的学术成果推荐给我国的广大读书界。

1991年9月29日在上海寓所

注释

- ① 见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7卷1号（1919年12月）。

序 二

陈鸣树

比较,从本质上说,基于客体世界各别事物都呈现有形无形的联系,存在于文化本源的一体性所延伸的网状结构。文学的可比性的比较固然容易一目了然,文学的表面上的不可比性(例如比较文学中的平行研究)实际上也在于发现大文化背景里的网状的纽结点。异点的比较在于找出潜在的相似点。当然,在这相似中也要找到确定该事物本质的真正的差别性。

比较的哲学意义黑格尔有过深刻的阐发,他认为通常所说的科学研究,往往主要指对于所考察的对象所采用的比较方法而说的。这方面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如果比较的任务满足于从两物的差别中求出同一,或者从两物的同一中求出差别,这还仅仅属于单纯的知性认识范畴。他说:“只要我们能承认惟有在现存的差别的前提下,比较才有意义;反之,也惟有在现存的相等的前提下,差别才有意义。因此假如一个人能看出当前即显而易见的差别,比如,能区别一枝笔与一

头骆驼，我们不会说这人有了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東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高的比较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小逻辑》）

在黑格尔看来，事物的本质即有具体同一和差别的特性。因为“有差别之物并不是一般的他物，而是与它正相反对的他物；这就是说，每一方只有它与另一方的联系中才能获得它自己的[本质]规定。”（《小逻辑》）

比如中西文论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也可以拈出很多相同的机理，钱钟书先生曾举狄德罗《关于戏剧演员的谗论》一文中的要旨为例，就是说，“演员必须自己内心冷静，才能惟妙惟肖地体现所扮角色的热烈情感，他先得学会不‘动于中’，才能把角色的喜怒哀乐‘形于外’”。钱氏认为，“在古代中国，民间的大众智慧也早就觉察那个道理，简括为七字谚语：‘先学无情后学戏’。狄德罗的理论使我们回过头来，对这句老话刮目相看，认识到它的深厚的义蕴。同时，这句中国老话也仿佛在十万八千里外给狄德罗以声援，我们因而认识到他那理论不是一个洋人的偏见和诡辩。……我们敢说，作为理论上的发现，那句俗话并不下于狄德罗的文章。”（《读〈拉奥孔〉》）在这里，我们从相差十万八千里的异地和异代中看到了同一，这是因为，“心之同然本乎理之当然，而理之当然，本乎物之必然，亦即合乎物之本然也。”（《管锥编》）

比较文学的确给我们开辟了新天地。它使我们同异域异地异代的文学展开了广泛的对话，而这种对话对文学本身的建设以及文学研究的思维深化来说，是绝对必须的。我们甚

至可以以比较文学来改变我们的思维习惯和心理定势。李达三在《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中揭示的旨趣具有超本体的意义：

比较文学是人文科学中最解放的一种，所以它颇能把我们从个人的心智型式与传统的思想模式中解放出来。比较的思维习惯使我们的心智更有弹性，它伸展了我们的才能，拓宽了我们的视界，使我们能超越自己狭窄的地平线（文学及其他的）看到其他的。

所以，比较文学所引起的思维的拓展对文学的其他研究方法都有启迪意义，它将超越于比较文学本体之上。

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展也渊源流长，有人将它追溯到司马迁的《史记》，但那是属于一种非自觉的文学比较。王国维写于1904年的《叔本华与尼采》，才开始了真正的比较文学。鲁迅早年所写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都将中西文化或文学作了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比较不是可有可无的一种方法，而是开拓人的视野和思路，进而认识自己的必不可少的观念。“意者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爱生自觉。……故曰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摩罗诗力说》）

“五四”时期对外开放，引入不少外国文化，因此，不但鲁迅，包括陈独秀、周作人、沈雁冰在内的一些先驱者常常将外国文化、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作双向比较，从而探

求中国新文学的建设,这也是比较文学的先声。据《清华大学校史稿》,在三十年代初,英国剑桥大学瑞恰兹教授还在该校开过“比较文学”的讲座。1937年,戴望舒译了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在这之前,傅东华译了罗力耶的《比较文学论》。四十年代,最值得提出的是钱钟书先生《谈艺录》的问世,从此国人有了独创一格的比较文学。钱氏在《序》中说:“凡所考论,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盖取资异国,岂徒色乐器用;流布四方,可征气泽芳臭。”这是因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谈艺录》开中西诗学互相发明、义蕴层出的创例。在方法上是打通各种可比的渠道,又以烛照中外古今的胆识,纠正了不少成说。钱氏后来所成的《管锥编》,更是独步古今的煌煌巨制,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复兴的标志。

同样,在现代文学领域,随着改革开放,从七十年代末开始了比较文学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比较文学的合奏中,顾国柱同志所奉献的《新文学作家与外国文化》一书,以自己独特的琴弦奏出了独特的乐声。

首先他将中国现代作家的比较扩展到文化的领域,如郭沫若与尼采的比较,林语堂与克罗齐哲学美学观的比较,这样寓影响比较与平行比较于一炉,大大扩展了视野。

其次,他本着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能够有什么讲什么,不设定一个先验的框架来规范自己。如说到鲁迅与弗洛伊德的关系时,能够将弗洛伊德的学说放在科学的鉴衡上,又对鲁迅所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以及对弗氏的看法作历史的评价,从而深化了这一课题。又如在《茅盾与尼采》一文中,既指

出茅盾早期出于因振奋民心而介绍尼采的思想动因，又揭示了茅盾对尼采“错谬的根本”所持的批判态度，这样就使读者对茅盾视野中的尼采有一个正确的看法。

最后，作者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对资料锐意搜求，对观点反复推敲，据我所知，寝馈于斯，已积数年之功，这就保证了本书的质量。故乐于为之序。

1991年10月8日于复旦大学

目 录

序·····	贾植芳
序二·····	陈鸣树
鲁迅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	1
鲁迅与果戈理的同名小说·····	14
鲁迅与爱罗先珂及其《小鸡的悲剧》·····	27
郭沫若与尼采哲学·····	37
郭沫若与雪莱及其《为诗辩护》·····	47
郭沫若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	59
茅盾与西方新浪漫主义·····	87
茅盾与左拉自然主义·····	100
茅盾与尼采哲学·····	115
郁达夫与日本“私小说”·····	124
冰心与泰戈尔及其“爱的哲学”·····	139
王统照与泰戈尔·····	154
老舍与狄更斯·····	169
林语堂与克罗齐及其“表现说”·····	191
艾青与西方近代诗画艺术·····	202

穆旦与西方现代派诗	227
后记	241

鲁迅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

鲁迅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有关系，他既没有完全肯定也没有完全否定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纵观二者的关系，鲁迅早期尚不能识破弗洛伊德学说的理论实质，受到了一定的消极影响。然而不久，通过翻译厨川白村的著作，对弗洛伊德便有了正确的认识，并进行了中肯的分析和批判。鲁迅具有伟大作家的现实主义精神，善于“拿来”外国的东西为我所用，他将弗洛伊德学说的若干合理因素提炼改造，运用在自己的创作之中，服务于现实社会的斗争，发挥了极强的战斗作用。

—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是奥地利的精神病医生，他在临床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精神分析的学说，成为精神分析学派的主要创始人。弗洛伊德在他的经典著作中表示：人的心理活动由意识系统和潜意识系统两个部分构成。意识系统小而并不重要，只代表整个人格的外表方面，而广阔有力的潜意识系统则包含隐藏的种种力量，是在人类背后的内驱

力。但是，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的主要内容却是性的冲动，他曾借用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弑父娶母的故事把这种性的冲动称为“俄狄浦斯情结”。正是在这个性冲动观念的基础上，弗洛伊德建立起他的一套精神分析体系。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强调潜意识在人的心理活动中的决定作用，并把人的精神变态、失误（语误、笔误等）、梦等等心理现象乃至人类社会诸如文化、艺术、科学、宗教活动的根源归之于性欲。它的产生有一定的社会历史依据：“在当时的奥地利帝国，尤其是在家长统治式的犹太族社会内，宗教气氛十分浓厚，社会禁忌十分严格，特别是对两性的关系，禁忌最严。因此很多生长在这样一种家庭和社会里的人就在某些形式的两性关系方面遭受到苦难。弗洛伊德的很多患者和弗洛伊德本人从小都受到了这种奥地利——犹太文化气氛的严重影响。”^①弗洛伊德把精神分析学说引入文艺创造，从人们的精神现象领域探讨文艺问题，这应该说是破天荒的事，所以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至今流行不衰。但他所研究的对象是精神病者，是人类心理的畸形和变态。弗洛伊德的错误，当然并不在他对于由性压抑而引起的变态心理分析，而是在于他离开了特定的社会条件和特定的命题范围，提出了泛性欲主义。弗洛伊德以性为心理动力的生理根源，仅仅从生物学的观点来分析人的本能，而否认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因此，这种学说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也是显而易见的。

同其它现代西方思潮一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在我国“五四”以后的文坛广为流传。鲁迅曾经是学医的留日学生，自然对它有更多的了解。鲁迅作为一个封建礼教的受害